

# 四牌楼20号的神秘主人

## ■四牌楼20号到底在哪里 ■汪精卫曾在四牌楼20号留下半条命 ■汉奸胡兰成为何藏身四牌楼20号

刘同鲁今年70岁,住在玄武区的进香河路。50多年前,还是孩子的老刘就住在这里附近的四牌楼20号。后来的岁月里,老刘的足迹遍布南京城的角角落落。退休后,兜兜转转,老刘又搬到了紧靠四牌楼的进香河路。脚步走过旧时街巷,童年影像再次清晰浮现在老刘脑海中:养着狼狗的沉默门卫,停着小飞机的院子,冬青树环绕成的十字架,高耸的焚烧炉……

这些影像,遥远又清晰。神秘的四牌楼20号,在自己住进去之前,它的主人会是谁呢?老刘想了又想,问了又问,却始终没有找到答案。 本版主笔 快报记者 白雁

### 身世神秘的四牌楼20号

说起四牌楼,南京人多半会联想到东南大学。沾了名校的光,四牌楼这个地名也多了几分儒雅。而记者从南京市地名办了解到,早在明代,这里就是“国立大学”国子监的位置,因为当时国子监在成贤街南端和东、西两侧曾竖立过四座牌坊,所以称四牌楼。

如今,牌坊早已不见踪影,地名却留了下来,指的是连接成贤街和进香河路的一条小路。路长不过400多米,东南大学的大门就面向这里。

在一个雨蒙蒙的早晨,记者跟着老刘来寻找他曾经的家——四牌楼20号。在见到老刘之前,记者发现道路两旁的门牌始终不见20号。在东南大学的门口碰面后,老刘带着记者向西走,大约150米后,停在了四牌楼4—7号。那里旁边是一条通道,走进,两边是几间低矮的民居。再往里走,迎面是一扇紧闭的铁门。老刘指着右边说:“我小时候,这里就是四牌楼20号,大门朝西,进去是个很大的院子,我和爸妈姐姐就住在里面。”

1950年,刘同鲁11岁,在四牌楼附近银行工作的父亲,带着一家四口搬到了四牌楼20号,在这里住了四年。

如今,虽然印象中的四牌楼20号消失得无影无踪,但却带不走老刘的记忆,脑海里反复出现的画面提醒他:曾经的四牌楼20号绝对不简单。

### 后院停着的一架小飞机成了谜

凭着印象,老刘绘出了四牌楼20号的平面图,把记者带到了50多年前。

沿着逼仄的巷子进去,右手是四牌楼20号的大门。左手是一间门房,看门人是个沉默的中年人,人称“小老王”。小老王有一条凶猛的狼狗,狼狗的眼珠子泛着绿光,很是吓人。沿着左手的路继续往里走,紧邻门房的是一间消毒室,门一年四季锁着,很少有人进出。消毒室的旁边是一排老式平房,一条长长的走廊连通各间屋子。平房在路的尽头拐弯,接着向右延伸。“向右的这一排房子,靠近东头的几间是住户的厨房。就在厨房的对面,靠近中心花园的地方,有一栋大院里唯一的两层小洋楼。楼房的南边,是呈十字交叉的两条路,路的两旁种着高大的冬青树。”

紧挨着厨房的,是一排南北走向的平房,老刘的家就安在其中的一间里面。这排房子尽头的厨房后面有一座焚烧炉。这排平房正对着的,是另一排南北走向的平房,平房的东侧是一个院子。

“就在这个院子,停着一架飞机,我们这些小孩,最喜欢干的事情就是爬上去开飞机。”飞机不大,机舱的高度仅够孩子们直立,大人进来就要弯腰了。老刘记得,飞机里有一捆一捆的深黄色包裹,整整齐齐码放着。孩子们最喜欢到机舱前部的驾驶舱扮成飞行员的样子,乐此不疲。突然有一天,飞机被拖走了。但孩子们很快又找到了新玩意儿,这个新玩意儿是房东家的小孩弄来的。

房东住在大院东南角,是个四五十岁的女人,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到各家收房租。她的名字有点怪,所以事隔50多年后,老刘还记得,“她叫过南大,路过的过、南京大学的南大。”

房东家的儿子和刘同鲁玩得很好,就在小飞机被拖走后不久,他拿来一把日本战刀和一些日本人的照片给刘同鲁看。他告诉刘同鲁,这些东西都是从他家的房子里翻出来的。这让刘同鲁吓了一跳。

隐秘的20号大院,和日本人有什么关系?那架飞机又是从哪里来的?老刘心头的这些秘密没来得及解开,1954年,为了给刚成立不久的南京工学院腾地方,他和父母以及其他邻居先后搬离了20号大院。

### 四牌楼曾是日本人的医院?

1961年,老刘进了城南的一家化工厂工作,他渐渐明白了20号大院的一些秘密。

“飞机肚里的深黄色包裹,非常危险,”老刘向记者分析,“那些包裹外包装的两头各画有两条红线。这是炸药的标志,我们当时根本不懂,还在上面跳来跳去。”而那架飞机,究竟是怎样到了这里,又是干什么用的,记者几经考证,始终没有得到可靠说法。

老刘分析,20号大院应该曾是一家医院。消毒室、焚烧炉,那是医院特有的。院子里那些由走廊连通的房间是病区。二层小楼房是医生的办公室,“冬青树围成的十字架,是提醒轰炸机不要误炸到医院。”

老刘认为,20号大院应该是日本人的医院。房东家的照片和日本战刀,那条狼狗,这都是证据。至于那架轰炸机,可能是日本人撤离时,因损坏而被废弃。那么,事实果真如老刘推测的那样吗?

记者找到中国近代史博物馆的副馆长刘晓宁,希望他指点迷津。刘副馆长表示,民国时期,中央大学就位于四牌楼,但关于四牌楼附近有个日本医院的事情,他并不清楚。而附近居民更是表示不知。

老刘言之凿凿,众人却不甚明了。这情景让记者忍不住怀疑,四牌楼20号真的会是日本人的医院?

为了释疑,记者又请教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的经盛鸿教授,并求助于南京的档案部门。当一些零零星星的资料被串起来后,记者有了意想不到的收获。

### 大拆迁中,四牌楼的这两处民房何以保留

1937年8月13日,日军进攻上海,南京危在旦夕。10月上旬,位于南京四牌楼的中央大学搬迁。1937年12月13日,南京沦陷,日本人长驱直入。为了按照自己的意愿重新部署南京城的格局,日本人在南京城展开一场声势浩大的拆迁工程,四牌楼20号也在其中。

民国时期的官方文件显示,1939年2月到8月间,负责管辖四牌楼的第三区公所连续接到多封公函。公函称,因为山本部队要征用,特务机关通知四牌楼地方自8号起至26号止都要拆迁;委派杨庆熊督办此事,凡在圈用范围内房屋,限3月10日前一律搬清。至于要拆迁多少户人家,公函称:“计征用洋式房124间,瓦平房135间又16披共20户。”

7月26日,又一封公函递到第三区公所,通知该区境内慕巷26号、四牌楼37—53号的单号被陆军医院征收,限令8月15日前完全迁走。

1939年2月25日,有关方面接到四牌楼20号居民孙光祖、南仓巷2号居民熊克谟等人的请愿书。请愿书中说,长期以来,他们一直居住在四牌楼,前段时间,地痞流氓把他们房内的装修拆空了,他们借修繕房屋;房屋刚修好,又接到日本人的通知,要求居民一个星期内搬家,否则就要动手拆除。居民提出,他们没有正式的工作,房产一旦收走,连最基本的生活保障都没有了,因此请求免于拆除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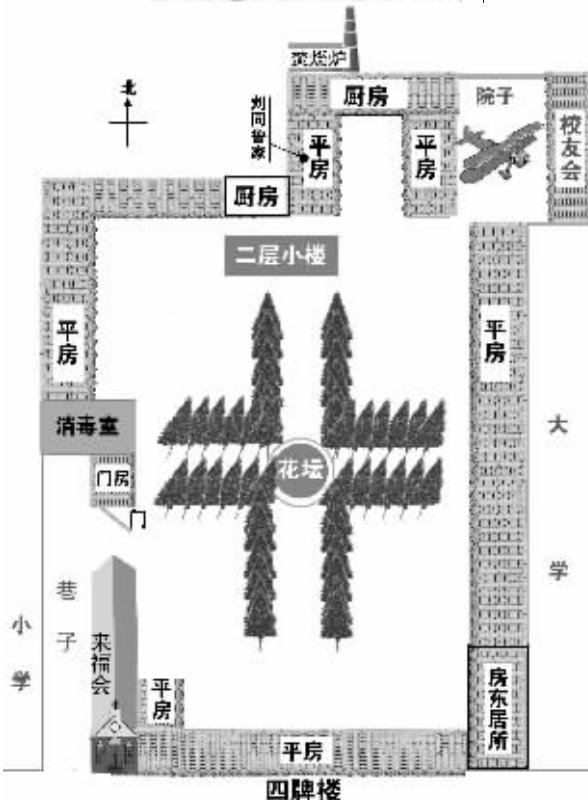
此后,居民连续递交请愿书,但无济于事。到了4月12日,原来居住在四牌楼20号的孙光祖不得不搬到了门西五间厅32号。

在这次大拆除中,请愿人孙光祖的房屋被全部拆除,但他的三位邻居却侥幸逃脱:一户是王姓人家南仓里的楼房,被指定为日本士兵宿舍;另一户是一所由美国人修建的来福会堂;还有一户姓人家的洋房。房屋虽然得以保留,但换了主人。

文件中的描述,和老刘的记忆吻合上了。老刘告诉记

## 发现 四牌楼秘事

DISCOVERY WEEKLY



老刘记忆里的四牌楼20号示意图 制图 俞晓翔

者,他住的20号大院,大门右手就是一家教堂,叫做来福会堂;而他们的房东,正是一位姓过的女士;而20号大院透露给老刘的信息,也与民国老档案的内容一致:南京沦陷期间,四牌楼是日本人陆军医院所在地,有重兵把守。

### 四牌楼20号留住汪精卫的半条命

翻开1943年的地图,沦陷时期南京的城市布局一目了然。原先的总统府成为日本第一区司令部;汪伪国民政府迁到了鸡鸣寺附近;在原金陵大学的位置建起了伪中央大学;而四牌楼一带是一片空白,那是因为,日本人已经在这里作为陆军医院,作为军事机构,这在地图上是不会标出的。

就是这包括四牌楼20号在内的日本陆军医院,曾经留住了汪精卫的半条命。

1935年11月,国民党召开四届六中全会时,汪精卫被南京晨光社记者孙凤鸣击中三枪。经手术,将颊部及颞部子弹取出,背部子弹因夹于脊椎,未施手术,遂引起多发性骨肿瘤。1943年夏天,日本在太平洋战线的败局已定。汪精卫环顾国际大势,陷入深深的绝望。8月,心力交瘁的汪精卫旧病复发,背部、胸部和两肋都疼痛难忍。他的病情迅速恶化。

12月,汪精卫就居于南京的日本陆军医院。医院院长后藤亲自为汪精卫检查,断定疼痛是由于子弹压迫神经引起的。12月19日,后藤主刀为汪精卫施行手术。汪精卫本人在日记中简单记录了手术过程:“11时开始手术,仅20分钟即将留弹取出。卧病院中。”

12月20日汪精卫回北极阁疗养。此后,院长后藤多次上门问诊。25日,后藤为汪精卫折纸,他可以坐起来谈话了。到了12月31日,汪精卫感觉自己恢复很好,在这天的日记中,他写道:“夜与亲友度除夕,初次下楼。”

然而,陆军医院还是没能把汪精卫从死亡路上拖回来。从1944年1月21日起,汪精卫连日高烧不退,创口奇痛,不能起床。3月3日,他飞往日本名古屋求医。11月10日,汪精卫客死他乡。

### 为保命,胡兰成假装日本伤员住进四牌楼

汪精卫死后不久,1945年8月15日,日本投降,重庆国民政府迁返,汪精卫手下的大小汉奸头目纷纷逃亡。此

时,位于四牌楼的日本陆军医院,以治病的名义,为汉奸和未及撤走的日本士兵提供了一个暂时的庇护所。

曾任汪伪宣传部次长的胡兰成,在他的《今生今世》一书中,就提到了其在四牌楼的日本陆军医院“养伤”的经历。

日本战败后,在武汉的胡兰成乔装成伤病员,搭乘一艘运载日本伤员的船只,赶到南京。此时,南京城里乱成一团。为防止遭到暗算,胡兰成住进了相对安全的日本陆军医院,因为级别比较高,他被安排进了将官病房。

第二天早晨,国民党陆军总部副总参谋长冷欣中将派人来慰问日本伤病员。来人将胡兰成当成了日本将领,也到他的病房门口宣讲蒋介石的意旨。多年后,在书中,胡兰成写到自己当时的反应时说,“而我是伤病者,可以卧床不理。”其中读得出几分庆幸,也透着些无耻。

这天晚上,日本宪兵队秘密招待胡兰成,席间,胡兰成得知冈村宁次已去了上海。两天后,他改扮成日本军少佐,坐火车离开南京前往上海。

### 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后,南京工学院坐镇四牌楼

胡兰成逃走后不久,日本陆军医院被国防部接管改为陆军医院,四牌楼一带的老居民也有一部分迁了回来。1945年11月,中央大学新校长吴有训赴南京,办理接收手续时,仍有数百号伤员未遣送,经与多方交涉,接收工作需延至次年2月。

迁回后的中央大学规模是战前的三四倍,原四牌楼校舍已经不够用了,于是学校设置本部和分部,四牌楼为校本部,丁家桥为分部。后来,学校又购买附近的兰园、成贤街等处房屋,用来扩充校舍。

1949年8月8日,根据南京市军管会文教委员会通知,国立中央大学改名为“国立南京大学”。同年10月10日,再次更名为南京大学。

1952年的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中,四牌楼本部给了从南京大学分出去的南京工学院,也就是现在东南大学的前身,而南京大学则设在天津路的金陵大学原址上。

老刘一家搬入四牌楼20号大院不久,这里就被南京工学院征用了,到1954年,15岁的刘同鲁一家搬离20号大院。(请爆料人刘同鲁先生领取线索费200元)



老刘说,这堵墙50多年前就在这里



在老刘记忆里,50多年前这里曾停放过一架小飞机 本版摄影 快报记者 辛一